

张静,王宁,刘世定,等.本土经验的理论化:问题、挑战与出路[M]//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第8卷.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本土经验的理论化：问题、挑战与出路^①

张静 王宁 刘世定 刘欣 沈原 陈家建 张博伦 吴肃然
洪岩璧 向静林 陈思宇 王金水 王润奇^②

编者按：由张静教授和王宁教授联合召集的“本土经验事实理论化”工作坊，于2025年3月26日在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举行。与会学者围绕理论与经验的辩证关系、方法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角色、从特殊到普遍、经验事实的理论化四个核心议题，提出了很多原创性观点，对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都极具启发性。我们特将此次会议的成果以综述形式集结发表，以飨读者。

在当前中国社会学努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一个悖论摆在了所有学人面前：一方面，我们拥有“本土经验”的富矿，转

①本文系“本土经验事实理论化”工作坊会议综述，由王润奇整理，与会发言学者审定，作者署名以发言先后为序。整理过程中，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张咏雪老师和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张琦博士提供了帮助，特致谢忱。

②作者简介：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宁，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欣，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沈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陈家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博伦，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吴肃然，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洪岩璧，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向静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副研究员。陈思宇，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学刊》编辑部副研究员。王金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调查与数据处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润奇（本文主要执笔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联系方式：wangrunqi@seu.edu.cn。

型期的中国社会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另一方面，我们的学术产出却普遍呈现出“细碎化”的特征，大量研究与有意义的理论关怀联系甚少，而既有的理论体系又常常无涉于解释鲜活的本土事实。这种理论与经验的脱节，不仅削弱了学科的解释力，更引发了关于学科价值的深层理论焦虑。许多年轻学人在今天更多是作为“理论的消费者”，他们学习并应用那些已经完成的经典理论，却对“理论如何从经验研究中产生”这一知识生产的核心过程知之甚少。正是在这样的集体困惑与求索中，一场旨在回归本源的“头脑风暴”应运而生。

以“本土经验事实理论化”为核心议题的工作坊召集了一批对此问题有着长期观察与深入思考的同人，试图直面并回应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经验研究应如何与理论发生有机关联？从经验中生成理论的具体路径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处理概念“本土化”与“普遍化”之间的内在张力？本土经验如何被有效“理论化”？这场春天的工作坊是一场旨在通过在场学者的密集思维碰撞来激发“建设性想法”的思想交流会。它不仅是对单一学术主题的探讨，更是一次社会学学术共同体为寻求学科自主性与生命力而进行的集体诊断与求索。

一、理论与经验的关系

张静的发言为整个工作坊奠定了基调，她系统性地诊断了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所深陷的困境，提出了以“经验导向”为核心的理论范式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她从两种长期主导中国学术思想的传统开始分析。

第一种传统是服务于特定任务的“思想工程”。在这种范式下，理论的首要功能并非解释世界，而是为现实的政治选择与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战略支撑及合法性论证。其评价标准是理论是否与某一历史时期的国家主要任务相吻合，是否能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新颖的概念表达或战略思想。这种理论生产模式的根本特征，是从一个既定的政治前提出发，进行宏大叙事的演绎与构建，其“理论创新”表现为提出一个能够高度概括当前任务的新概念。这种传统使理论研究承担了较多的政治功能。

第二种传统根植于中国深厚的“人文历史思维”。这种传统更为隐秘，但影响同样深远。它的基本任务是传承，通过继承精髓和不断诠释经典获得新解，成为引领思想的旗手。这种思维模式认为，“理论危机”来自对经典开创的精神路线的偏离，解决之道在于“继绝”——也就是继承和回归经典的基本精神。这种“朝向已知”的回溯性反思，与“朝向未知”的向前性探索有所不同。经验导向的理论旨在探索尚未知晓的经验现象背后的原理，而人文思维的理论则倾向于对经典进行再诠释，这种反思主要在表达认识者心中的经典。它与社会科学思维的区别类似于达·芬奇画树与倪瓒画树。达·芬奇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精神的代表，他细致入微地研究树干、树皮、树根的物理结构，以及树与阳光、空气之间的光学关系，其画树的目标是无限逼近现实中“真实的树”，即反映客观事物。与此不同，元代画家倪瓒画树不追求逼真，关键更在“写胸中逸气”，表达的是画家本人对自然的认识及其品格与精神境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人文思维的写照。它追求的是“善”与“美”的统一，是精神世界的“气韵”与“理想”。

而“经验导向的理论观”，首先承认存在可被认识的、具有客

观特征的社会事实。其次，它将“理论”定义为一种解释现象的原理，并且期待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普遍化（不仅能解释单一现象，更能解释同类现象）。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是面向未知的发现，它致力于发现那些我们尚未知晓的社会运行逻辑。社科创新之所以备受“无用”的诟病，与我们长期在这种“朝向已知”的思维定式中循环有深刻关联。

王宁的发言将讨论引向了具体的研究实践层面。他捕捉到当前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学生所做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困惑：面对经验事实，理论从何而来？是应该从马克思、哈贝马斯等经典武库中“找来”一个现成的框架进行套用，还是应该从经验研究中“提炼”出一个新的理论？这个问题的背后，实质上是如何处理研究者与既有理论知识体系的关系。为了系统性地解答这一问题，王宁首先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区分，即将既有的理论体系称为“存量理论”（stock theory），并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指的是那些高度抽象、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宏大理论框架，如马克思主义、符号互动论、结构功能主义、女性主义等。这些理论提供的是一种观察世界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基本逻辑。第二个层次是“实质理论”（substantive theory），指的是那些由其他研究者通过具体的经验研究提炼出来的、针对特定社会领域的中层理论。例如，关于组织行为、社会分层或城市社区的具体理论模型。

基于这一区分，王宁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提出了经验研究实现“理论贡献”的三种主要路径。这三种路径实质上是新研究与“存量理论”进行有效对话的三种不同模式：第一种路径，可称为“补丁模式”（patching model）。这种模式主要针对既有的“实质理

论”。研究者在文献回顾中发现，某个中层理论在解释特定现象时存在漏洞，考虑不周，或者忽略了某个关键变量。于是，他通过自己新的经验研究，找到这个被遗漏的变量或修正原有的作用机制，从而像“打补丁”一样，对这个存量理论进行完善和补充。这是一种增量式的理论贡献，虽然不是颠覆性的，但却是学术知识得以积累和精化的重要方式。例如，周雪光（2005）对软预算约束理论的修正，通过加入“逆向”一词，精准描述了乡镇企业中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独特的谈判关系，就是对原有理论的精妙“打补丁”。第二种路径，是“替代模式”（replacement model）。当研究者发现，某个既有的理论（尤其是直接从西方引进的理论）在应用于中国本土的经验事实时，发生了根本性的矛盾和不适用，甚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时，就为理论创新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王宁，2022）。此时，研究者的任务不再是修补，而是要基于对本土经验的深刻洞察，提出一个全新的、更具解释力的“替代理论”。这种贡献是颠覆性的，它直接挑战了既有理论的适用边界，并试图建立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第三种路径，是“降维创新模式”（substantive innovation model）。这种模式处理的是“形式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关系。研究者并不试图去挑战或修正像马克思主义或结构主义这样的宏大形式理论，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分析的“视角”或“启发”，指导自己去研究一个具体的、尚未被充分理论化的经验现象。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运用形式理论的逻辑，最终总结和提炼出一个全新的“实质理论”。这一点明确了核心观点：研究者即便不在宏大形式理论的层面上直接介入争论，仍然能够作出实质贡献。

王宁的这套框架，回应了“没有人能带着空白大脑去田野”的观点。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带着理论，而在于我们带的是哪种理

论，以及我们打算如何与它互动。他区分了“用理论指导研究”与“用理论裁剪现实”的根本不同。前者是在存量理论的地图上寻找未知领域或修正错误路线，后者则是拿着一张旧地图强行规定现实的地形。他将“理论贡献”这一看似高不可攀的目标分解为具体、可评估、可实践的学术行动，告诉研究者他们有潜力通过每一次严谨的经验研究与“存量理论”的对话，在知识版图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刘世定剖析了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能力普遍匮乏的病理根源。他的批判将讨论的重心从“应该做什么”的价值层面直接下沉到“我们有没有能力做”的核心技能层面。

刘世定首先直指理论教学的系统性不足。他指出，中国大学里绝大多数的“社会学理论”课程，实际上是“理论史”和“人物史”课程。课堂上充斥着对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生平思想的介绍和梳理，学生们学到的是一堆“关于理论史的知识”，而不是“进行理论思考的能力”。更严重的是，许多讲授理论课的教师自身也缺乏将理论与经验进行互动的思维训练。这种教学模式的直接后果是，学生们带着一脑袋的理论家名字和宏大概念进入田野，却完全不知道如何将这些“知识库存”转化为分析具体经验现象的“思维工具”，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当学生求职时讲出一堆哈贝马斯等人物的理论而对方不知所云时，这不仅是学生的尴尬，更是整个学科教育体系的尴尬。

在此基础上，刘世定提出了具备诊断力的“三无”困境说，简洁地描绘了当前学术论文在理论建构上三个层次的失败：第一个层次是“有词语无概念”（words without concepts）。这是最普遍的理论幼稚病。研究者在完成了大量的经验调查后，感觉需要“理论升

华”，于是基于直觉创造出一个看似新颖的词语。然而，这个词语仅仅停留在比喻或直觉层面，研究者并未对其进行严格的学术界定，没有明确其内涵与外延，没有阐述其结构与维度。它只是一个标签，而不是一个具有分析效力的科学概念。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伟大，不在于这个词本身，而在于其背后有一整套关于“圈”的结构性理论思维支撑。第二个层次是“有概念无命题”（concepts without propositions）。相比第一层，这是一种进步。研究者成功地将一个词语界定为了一个清晰的概念。但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并不构成理论。理论的最小单位，至少是一个揭示两个或多个概念（或广义的变量）之间稳定关系的命题。大量的研究在提出了核心概念后便戛然而止，未能进一步构建出这些概念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因果或相关命题。这种状态，刘世定称为理论思维的“萌芽状态”，离真正的理论建构尚有距离。第三个层次是“有命题无条件”（propositions without conditions）。这是更为高级和隐蔽的理论缺陷。研究者成功地提出了一个命题，例如“A导致B”。然而，他们却忽略了任何一个科学命题都必须存在的“边界条件”，即这个命题在何种前提下、何种情境中才能成立。缺乏对条件的明确界定，使得理论的适用性变得含混不清，也使其无法被有效地验证或证伪。他特别批评了许多研究者将统计分析中的“抽样范围”误解为理论的“条件”，前者只关乎结论的推论范围，而后者则是理论逻辑成立的内在前提。刘世定用了一个生动的隐喻来总结他的观点：社会学是一个“富矿”，充满了珍贵的经验材料，但我们极度缺乏将其加工为成品的“冶炼技术”。我们多数时候只是扮演着“采掘业”工人的角色，辛苦地采集一堆事实，继而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处理。

刘欣提供了一套具体的解决方案。他试图弥合社会学内部长期存在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之间的巨大裂痕，其核心论点在于：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而优秀的研究能力，体现为一种在抽象理论与经验现象之间自如“穿梭”的思维能力和链接技艺。“概念模糊”是阻碍我们进行清晰逻辑思考的致命弱点。更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必须脱离具体时空的形象思维，进入抽象的概念思维。作为思考的基本单位，概念是构建理论大厦的要素。因此，无论是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概念化”这一核心环节。

为了打破学界对不同研究方法的刻板印象，尤其是对量化研究的偏见，刘欣以彭玉生（Peng, 2004, 2010）的系列论文为例，说明了量化研究如何在理论与经验之间穿梭并形成新的理论贡献，其分析极具说服力。彭玉生运用量化方法，探讨了中国乡村的宗族网络对经济增长、生育率等问题的影响。刘欣引导与会者思考，如果我们从经验资料出发开始思考，那些指标或变量，如村庄的“最大姓户数百分比”“是否有祠堂”“私营企业数量”“生育率”，是如何被转化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理论概念的。他分析道：

（1）村庄“最大姓户数百分比”和“是否有祠堂”这些具体指标或自变量，在研究中被概念化为乡村宗族网络的“规模”与“强度”，进而上升为“非正式规范”这一抽象程度更高的理论概念。

（2）“私营企业数量”和“生育率”这样的具体经验指标或因变量，则被概念化为“村民利益”，进而上升为“组织成员利益”这一抽象程度更高的理论概念。

（3）在陈述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时，考虑条件变量“计划生

育政策与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是否冲突”，或者“私有产权制度是否缺失”。这些条件变量，可以分别概念化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相冲突”“正式制度缺失”。

通过这一系列巧妙的“概念化”，一个原本看似属于人口学或经济学议题的研究，成功地转变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组织社会学理论命题：“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相冲突的情形下，非正式规范能够软化正式制度的刚性，进而保护组织成员的利益”，或者“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情形下，组织成员会利用非正式规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两个中层理论命题，分别“覆盖”了（或从中可以演绎出）关于变量间关系的一组经验层次的命题（或可以通过对经验现象的观察判断其真伪）。例如，前者所覆盖的经验层次的命题有：计划生育政策与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相冲突时，村庄的最大姓户数百分比越高，则村庄的生育率就越高；或者，计划生育政策与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相冲突时，有祠堂的村庄比没有祠堂的村庄生育率更高；等等。后者所覆盖的经验层次的命题有：在私有产权制度缺失的情形下，村庄的最大姓户数百分比越高，则村庄的私营企业数量就越多；或者，在私有产权制度缺失的情形下，村庄的最大姓户数百分比越高，则村庄的个体经济数量就越多；等等。这些研究案例表明，量化研究绝非简单的“跑数据”，其背后同样蕴含着深刻的理论思考与概念化过程。它不仅不排斥理论，反而能够通过概念化澄清模糊的理论观念，使其更具明晰性和可证伪性。

在此基础上，刘欣提出了“穿梭”隐喻。他认为，学生之所以在研究中感到困惑，根源在于他们无法在两个关键问题之间建立联系并自如“穿梭”：一个是“理论问题”，例如，“在正式制度与非

正式规范相冲突的情形下，非正式规范能够软化正式制度的刚性，进而保护组织成员的利益”这一理论命题，可否解释“计划生育政策与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相冲突时，村庄的最大姓户数百分比越高，则村庄的生育率就越高”这种经验现象？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注意的是，理论问题是对理论命题可否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疑问。这里的理论问题，并不能简单表述为“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相冲突的情形下，非正式规范是否能够软化正式制度的刚性，进而保护组织成员的利益？”这样的表述，没有在理论与经验层次之间实现“穿梭”，仅仅在理论层次上考虑了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而非贯通“理论”与“经验”的理论问题。另一个是具体的“经验问题”，例如，“当计划生育政策与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相冲突时，村庄的最大姓户数百分比越高，村庄的生育率就越高吗？”就是一个经验问题，它是可以通过对经验现象的观察判断真伪的，即具有可证伪性。一个好的研究，其价值就在于能够用所提出的“理论”去解释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经验问题”，而这些经验问题又具有可证伪性。这种在不同抽象层次的命题之间“穿梭”——无论是通过概念化还是操作化，抑或循环往复——的能力，正是社会学研究者需要培养的核心素养。

刘欣还提醒，在构建理论命题时，要注意避免将抽象程度不同的概念用于同一命题之中。把抽象程度较高的概念与抽象程度较低的概念（具体指标或变量）放在同一个命题之中，可能导致逻辑混乱，而没有实现在“理论”与“经验现象”之间的“穿梭”。例如，“非正式规范”是一个抽象程度相对较高的概念，而“私营企业数量”是一个抽象程度较低的概念，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抽象层次。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概念放在同一个命题中，就会产生“在正式制度缺

失的情形下，组织成员会利用非正式规范来增加村庄的个体经济数量”的命题，这是一个逻辑层次不清的命题，也令人费解。同样，“当计划生育政策与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相冲突时，非正式规范越强，村庄的生育率就越高”也是一个逻辑层次不清的命题。在一项研究中，从最高层次的抽象命题到最低层次的经验命题，可能有若干推演过程中的不同抽象层次的命题。这些命题的抽象程度取决于命题中概念的抽象程度，例如，“非正式规范”的抽象程度比“宗族凝聚力”高，而“宗族凝聚力”的抽象程度又比“有祠堂”高。

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三个抽象程度不同的概念，分别用于三个抽象程度不同的命题，例如，“非正式规范能够软化正式制度的刚性，进而保护组织成员的利益”“宗族凝聚力能够软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刚性进而保护村民的生育权利”“有祠堂的村庄比没有祠堂的村庄更难实施节育措施而生育率更高”，就是三个相应的抽象程度不同的命题，其中高层次的命题“覆盖”了（可以推演出）低层次的命题。在三个层次的命题间“穿梭”时，既可以从低层次命题开始，借助“概念化”将经验层次的变量不断“概念化”向上抽象，也可以通过“操作化”把抽象程度较高的概念与经验现象联系起来。作为研究成果的论文，常常以中规中矩的归纳或演绎的方式展示作者的思考结果，但作者在思考过程中，可能是循环往复的。有些可能是与实际的思考或研究过程相反的。例如，我们看到的彭玉生的论文所展示的是从理论到假设再到用统计结果检验假设的演绎性研究过程，但在实际研究中，他完全有可能是先有了数据模型，再在不断“概念化”的过程中建构出自己的理论命题的。我们不能把量化研究简单地视为演绎性研究，同样，质性研究也有从抽象的理论开始的。此外，在很多有理论原创性的论著中，无论其方法

是量化的还是质性的，经验资料与理论都是浑然一体的。我们要避免陷入因论著中用了量化的或质性的方法或资料就认为它是“经验研究”的误区。例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开篇就引用统计数据描述宗教信仰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但谁会把它看作经验研究论著呢？而布迪厄的《区隔》《国家精英》都用了不少量化和质性资料，又有谁会否认它们是理论论著呢？

沈原的发言强调实践智慧与现实主义取向。他将抽象的方法论原则转化为在田野中具体可感的行动策略，并揭示了理论创新的真正动力来源。沈原首先明确，“观察渗透理论”这一命题在科学哲学中早已是共识，社会学无须再为此争论。真正的挑战在于“how”，我们究竟要如何完成从具体的、混杂的经验素材到抽象理论的飞跃？这需要的是“功夫”，是一种在实践中磨炼出的手艺。

他提出了“双重困惑”框架，认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其起点必然是两种困惑的交织与碰撞：第一重是“经验困惑”（empirical puzzle）。这是研究的“初心”，即在现实世界中遇到的那些让我们感到好奇、惊讶、与直觉或常识相悖的现象。他以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经典研究为例：布洛维进入工厂后最大的困惑是，这群工人既不拥有生产资料，也无法控制劳动过程，但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地投入生产，甚至相互之间展开“资本主义的劳动竞赛”，心甘情愿地成为“剥削自己的帮凶”？这种鲜活的、发自内心的“为什么”，是研究最原始的驱动力。

第二重是“理论困惑”（theoretical puzzle）。仅仅有经验困惑，只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作为学者，还必须能够提出理论困惑。这意味着，当我们试图用脑海中已有的“理论库”去解释那个“经验困惑”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既有的理论“对不上号”，甚至完全

解释不通。在布洛维还是年轻人的时期，主流的劳动过程理论是布雷弗曼（Braverman）的“去技能化”和“客体化”理论，认为工人在流水线上已完全丧失主体性。然而，布洛维在他自己的田野中看到的却是生龙活虎、充满主体性的工人。这种经验事实与主流理论形成的巨大悖论，构成了他的“理论困惑”。沈原指出，当这种悖论出现时，研究者最不应该做的就是“用理论裁剪现实”。相反，悖论一出现，研究者就应该意识到“我的机会来了”。这种矛盾与冲突，恰恰是进行理论修正、补充乃至“重构”的最大动力。他批评了中国教育体系中长期存在的“顺茬说”的思维定式，强调真正有创造力的学术工作，恰恰在于敢于发现和直面那些“戛茬的现实”。此外，他还强调了研究者所携带的“理论库”对其田野观察的决定性影响。我们的脑子里装了什么样的理论工具，决定了我们在田野里能“看见”什么，以及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一个理想的研究者，其理论库中应该备有“十八般武艺”，能够从多个视角去审视和捕捉现实的复杂性。

二、从经验中生成理论的具体路径

在工作坊对理论与经验的辩证关系达成初步共识后，讨论的焦点转向了更具实践性的层面：社会学究竟应该以何种方法论姿态自处？它所生产的知识具有何种特性？在面对内外部的多重压力时，它的研究方法和知识形态又该如何演进？这一阶段的讨论，由一场关于社会科学“科学性”的呼吁开启，最终在对“理论思维”的共同强调中结束。

陈家建的发言充满了“价值辩护”色彩。他深刻地感受到了学

科所面临的整体性压力，并认为，社会学若想在充满功利主义评价的体系中获得自身的尊严与合法性，就必须展现出一种“科学精神和气质”。他所言的“科学精神”，并非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的数据方法，而是指一种致力于探寻和揭示社会现象背后内在的“规律性机制”。他以韦伯（Weber, 2024）在《学术与政治》中提出的“清明”（Klarheit）概念为引，主张社会科学的核心功能应是呈现社会本身的运行机制，从而为政策制定和实践行动提供可靠的认知地图。只有当学科能证明社会进程中存在着不以个人或单一组织意志为转移的“硬核”规律性机制时，它才能获得真正的尊重。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列举了一个具体的政策改革案例：公务员系统的“职务与职级并行”改革，初衷是拓宽基层公务员的晋升渠道，但实践中反而加剧了资源向领导岗位集中的趋势。这个案例指向一个结论：许多看似完美的顶层设计，一旦进入真实的组织和社会场域，就会遭遇强大的、具有规律性的反作用力。陈家建强调，社会科学的规律与自然科学不同，它往往是延迟性的——一个政策的短期效果可能与其中长期效果截然相反。因此，社会学家的责任，就是通过长时段的追踪研究，将这些深层的、延迟的规律性呈现出来。他呼吁社会学研究应当以揭示这些规律性机制为使命，这既是学术上的追求，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应有的智识贡献。

面对陈家建充满理想主义的呼吁，沈原提出了质疑与另一种可能的路径。他直言不讳地反问：“他不认为你掌握了规律性的东西怎么办？”“你觉得权威是可以听你的吗？”这番话将讨论从学理上的“应然”直接拉回了政治现实的“实然”层面。沈原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试图通过揭示“规律”去“说服”或“启蒙”权威是一种过于乐观的设想。在这种背景下，他倾向于以一种更为审

慎和坚韧的学者姿态去录写和理解现状。他认为，在当下，社会学者的首要责任就是用专业的方法，忠实地记录下这个急剧变迁的时代中社会各行各业的真实状况，并加上自己的理解与分析，为后人留下一份信实的档案。他反思道：“否则后人真会骂我们——你们生逢变迁的时代，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波兰尼写出了《大转型》，你们写了什么？”这番话将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从即时的政策影响力转向了更具历史纵深感的“见证”与“存史”功能，宛如李贽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尽管看似悲观，但沈原对“录写”的要求却极为严格。他强调，好的田野研究绝非走马观花，其产出的材料质量直接决定了后续理论化的可能性。为此，他引用了马里奥·路易斯·斯莫尔（Mario Luis Small）提出的评价高质量田野材料的五个标准（Small M.L. and Feldman J., 2011; Small M.L., 2013; Small M.L., Manduca R. A., and Johnston W. R., 2018; Small M.L., 2021）：

（1）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即研究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像被研究者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的行为；

（2）异质性（heterogeneity），即材料中是否包含了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声音与事实；

（3）可感知性（palpability），即描述是否具体、生动，具有时空坐标，能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4）追踪追问（follow-up），即是否对关键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深入的追踪调查；

（5）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即研究者是否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在场、提问和互动对材料生产所造成的影响。

这五个标准，为看似主观的田野工作提供了一套严谨的质量控制体系，也使得他所主张的“录写”超越了简单的资料收集，成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学术实践。

刘欣则从认识论或知识论（epistemology）的层面，为陈家建所提出的“规律性”问题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哲学界定，从而有效回应了前两位学者的争论。他指出，社会科学能否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规律”（law），首先需要厘清社会科学家所陈述的命题究竟属于何种类型。

他引入了科学哲学中的两种经典命题模式：一种是“DN模式”（Deductive-Nomological），即演绎-定律式。这种模式所陈述的现象之间的联系如同自然定律一般，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另一种是“IS模式”（Inductive-Statistical），即归纳-统计式。这种模式所描述的联系是或然性的，即“如果A发生，B在多大可能性上会发生”，是现象间具有一定稳定性联系的规则（regularity）。虽然有人称之为“规律”，但要注意此“规律”（regularity）不同于彼“规律”（law）。刘欣更倾向于称前者，也即社会科学的“规律”为“或然性规则”（Reynolds, 2015）。

刘欣明确指出，社会科学家所作的大部分判断都属于“IS模式”。例如，“教育程度越高，收入就越高”这一命题，其本意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多大概率或可能性上带来收入的提高，而非一个必然的因果定律。他风趣地说道：“如果我们社会科学真能掌握DN模式的规律，那么有人可能就不会坐在这里讨论问题，而是直接去股市投资了，只赚不赔。”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回归分析 R^2 能达到0.3就已相当不错，这与自然科学追求的确定性相去甚远。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引用了默顿（Merton，1968）关于三种知识体系的划分，来定位社会科学的独特性质：（1）人文学科的知识（如《红楼梦》）是不可替代、不可积累的；（2）自然科学的知识（如牛顿定律）则是可替代、可积累的，新的理论会完全取代旧的理论；（3）社会科学则尴尬地夹在两者之间——它既有一定程度的可积累性，使得前沿对话成为可能，又带着与历史和人文不可割舍的情怀，使其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忘怀经典。这种介于二者“中间”的特性，也解释了为何当今一些社会管理者，一头热衷于能“装点门面”的国学、艺术，另一头追捧能“直接应用”的AI技术，而对社会科学（除部分权术外）则显得兴趣寥寥。

刘欣的分析，为整场讨论提供了关键的“标尺”，它使得大家能够在一个更明确的知识论框架内，去理解社会科学的“规律”究竟是什么，以及它的局限与可能性何在。

刘世定的发言直接对陈家建的“规律”提法进行了方法论上的修正。他坦言，听到这种提法感到“意外”，因为仿佛回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告诫政府“不能违反经济规律”的那种相对朴素的思维范式。他主张，当代成熟的社会科学，尤其是在与政策制定者对话时，所采用的语言不应是宣告式的“我们有一个规律”，而应是分析式的“条件式后果分析”。这意味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并非去寻找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而是去清晰地阐明“如果（if）采取某种行动，在什么样特定的条件（conditions）下，那么（then）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consequences）”。

这种“如果-那么”的条件式思维，相比于“规律”思维，具有几个明显的优势：（1）更精确，它承认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情境依赖性，将“条件”作为理论分析的核心要素，避免了过度概括。

(2) 更严谨，它为理论的验证与证伪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一个理论的失败，可能不是命题本身错了，而是其成立的边界条件发生了变化。(3) 更具操作性，在政策咨询中，它能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而不是给出一条模糊的“规律”。例如，与其说“市场有规律”，不如分析“在当前信息不对称和信用体系不完善的条件下，如果完全放开市场准入，那么可能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

刘世定强调，这种思维方式并非否定社会现象中不存在稳定的联系，而是主张以一种更严谨、更具分析性的方式去表述这种联系。他认为，只要我们的知识储备足够，就完全有能力在面对一个政策问题时，清晰地讲出其可能的多种“条件性后果”，而这才是社会科学知识力量的真正体现。

张博伦的发言将一股强烈的时代焦虑注入了讨论。他将学科的内生危机与外部的技术冲击——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的崛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引发了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与传播形态的根本性质疑。

他坦言，近期的“复旦校长访谈”事件和AI的飞速发展让他备感焦虑，因为AI生成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科学的某些话语形态非常相似，这无疑将导致社会科学知识的“贬值”。这对理论教育产生了一个挑战：当我们能教给学生的言说都可以被语言模型轻易模仿时，我们的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何处？当学生可以使用AI“模仿”学术写作风格而难以被察觉时，我们传统的学术训练体系将如何维系？这种深切的焦虑，使他进一步质疑了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以“论文”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和评估体系。他问道：“理论知识一定要以论文为载体吗？”论文只是诸多铭刻装置（inscription devices）中的一种（Latour, 2012）。他引用工程领域和艺术领域的

成功案例，暗示知识生产的路径可能是多样的。面对一个信息过载、信噪比极高的时代，传统期刊论文这种载体，其生产、评审和传播的效率与影响力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基于这种判断，他大胆地提出了对知识形态进行创新的设想。他建议，未来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或许可以寻找新的“铭刻装置”，例如，更多地采用“案例库”（case library）或“工作坊”（workshop）等形式；再例如，建立一个共享的、高质量的田野笔记或定量数据平台，以集体研讨的方式进行分析与理论提炼。这不仅能打破个体研究的壁垒，也更能适应新一代学者的学习和工作方式。张博伦的发言，反映了青年一代学者在面对技术与体制双重压力时所产生的颠覆性思考，他将方法论的讨论从“如何写好一篇论文”推向了“我们是否只要写论文”的未来维度。

吴肃然的发言，则从一个社会学人的专业生存与尊严的角度，回应了陈家建最初的呼吁。他将陈家建追求的“规律性”解读为一种对“刚性”（rigidity）的追求。他认为，在当下这个社会科学面临多重压力的环境中，既有来自政府的政治压力，又有来自大众媒体、流量经济的消解力量，社会学如果不能展现出其知识的“刚性”，就很容易被边缘化，被视为可有可无。所谓的“刚性”，就是指社会学的知识和判断，应当具有一种不容随意扭曲、不可轻易否定的力量，能让外界——无论是权力机构还是社会大众——在面对它时，不得不认真对待。然而社会学知识的“刚性”常常会与现实的权力逻辑发生冲突，这就是目前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主要困境。

在上半部分讨论的最后，王宁与张静对前两个阶段的各种观点进行了综合与升华，将讨论引向共识。王宁首先对社会科学“规律”的特性进行了补充。他指出，社会科学的“规律”与自然科学

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允许例外。这源于人类社会包含了主观意识这一变量。他提到了“自证预言”等现象，说明人的观念和行动本身就会成为影响社会进程的因素，从而导致规律的边界是动态的、可变的。因此，社会科学的核心，或许不应是寻找铁板一块的“规律”，而应是揭示其背后的“机制”（mechanism）——即在何种边界条件下，各种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并产生特定结果的。

张静提出，“规律”这个词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极易引发大而无当或教条化的联想。因此，她建议用一个更精确、更少歧义的表达来替代——一般性程度较高的理论（theory of a higher degree of generality）。这个提法既保留了对普遍性知识的追求，又避免了“永恒真理”的误解，可以化解此前讨论中的核心张力。我们今天要教给学生的，既不是具体的知识产品（因为图书馆和AI都能提供），也不是某种特定的写作范式。我们唯一无法被替代的，也最应该传授的，是一种发现知识、生成理论的“思维方式”（a way of thinking）。这种思维方式包含了如何进行概念化，如何建立命题，如何界定条件，如何进行因果分析等一系列核心的分析性智力活动。

三、从特殊到普遍

在就理论与经验的宏观关系达成共识后，工作坊的讨论自然地深入到第三阶段的核心议题：如何实现从“特殊”到“普遍”的知识飞跃。这一阶段的探讨始于对当前研究方法与教学模式的反思，经过张博伦的“失败”案例所引发的激烈方法论辩论，最终在对“桥接性概念”与“理论拓展”的共同认知中，为理论的生成描绘

出了一种可能路径。

吴肃然的发言，以其过去二十年的个人学术心路历程为载体，生动地呈现了一位学者在“理论与经验”“宏大与微观”之间反复求索的挣扎与演变。他的反思不仅是对个人学术路径的回顾，更是对一代社会学人普遍困惑的深刻写照。他坦言，自己最初被社会学吸引，源于一些简洁的概念（如“角色冲突”）对自己日常生活经验的强大解释力。然而，当他正式进入学科训练，学习了以“假设-检验”为核心的科学方法论后，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他发现，大量经验研究耗费巨大精力，最终只是论证了一个平淡无奇的常识，缺乏真正的知识贡献。同时他还发现，不同的质性研究者只是因为自身所持理论立场的差异，就对同样的现象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这使他一度转向对经验研究的否定，沉迷于宏大理论和方法论的思辨魅力之中。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反思。他逐渐意识到，社会学这门学科之所以强调经验研究，乃是一种知识的沉淀后果，当前的很多理论谜题在西方思想史上早已被反复讨论过，绝大多数理论社会学研究很难展现出真正的新意。像沈原团队所做的卡车司机调查这类扎实的经验研究，揭示一个不为人知的社会群体的现实状况，才是社会学的立身之本。最后，他批判了当前学术界对“中层理论”概念的滥用，以及在教学中存在的僵化与功利主义问题（如学生倾向于复制国外研究的量化模型以求快速发表）。他最终表达了对沈原所倡导的“案例教学法”的强烈认同，认为这是将学生从抽象、僵化的方法论规则中解放出来，培养其真正研究能力的有效途径。

张博伦在本阶段分享其“失败”的田野案例，生动地展示了一个理论雏形在诞生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不确定性。他首先提出了

一个“经验困惑”：一家技术实力雄厚的中国顶尖云计算公司，为何在进入美国市场时，连一个被广泛认为中国领先的“支付环节”都实施得吃力，并因此影响了整个项目？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他发现这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在中国，支付流程被阿里、腾讯等巨头高度整合，形成了一个“打包好”的封闭系统；而在美国，支付体系更像一个由信用卡公司、银行、各类供应商组成的相对开放的“组织-技术生态网络”。中国公司在与这个异质性网络进行“对接”（interfacing）时，遭遇了巨大的制度与文化冲突，而这些冲突最终都以技术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基于此，他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来理解这一过程。第一个是作为方法的“翻译”（translation）。他认为，理论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将田野现场中那些地方性的、充满技术“行话”的语言，“翻译”成社会学界能够理解和对话的通用分析语言。第二个是作为理论产出的“接口政治”（interface politics）。他试图用这个新概念来概括在不同技术系统、组织形态和制度环境相互“对接”时，所发生的围绕标准、控制权和利益的复杂博弈。这个概念试图超越纯粹的技术或文化解释，指向背后更深层的在历史中形成的权力关系。然而，张博伦也坦诚地反思了这一理论化尝试的“不成功”之处。他认为，自己目前可能只做到了“有词语没概念”或“有概念无命题”的阶段。他提出了“接口政治”这个新名词，但其内涵、作用机制以及成立的边界条件仍有待阐发。他面临的最大困惑是，这个高度抽象的理论概念（接口政治）与他试图解释的具体经验现象（项目失败）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均衡”的联系。他尚不能清晰地论证，他提炼出的这个概念，是否真的能有效解释那个最初的谜题，以及它是否具有足够的普遍性，能够“旅行”（travel）到其他案例中去（例如，从支付系统对接的

失败，到大语言模型审查系统的对接)。张博伦的困惑真实地再现了理论化过程中最艰难的一步：如何确保从特殊案例中提炼出的抽象概念，既能忠实于该案例的复杂性，又具备超越该案例的普遍解释力。

张博伦的发言立即引发了学者的几种不同但极具启发的方法论回应。沈原首先提出了质疑，他引用了社会学家研究实验室的例子，主张研究者并不需要完全理解被研究对象的“技术语言”（如代码如何编写）(Latour, 2012)。他认为，我们可以像人类学家观察原始部落一样，将科学家视为一个“部落”，重点在于理解他们的行为对他们自身的意义是什么，而非试图进行技术层面的“翻译”。他继而抛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是接口的‘政治’，而不是接口的‘文化’或‘制度’？”这一追问，迫使理论的提出者必须为其概念的选择提供充分的学理辩护，从而推动了概念的精确化。

与此相对，刘世定则高度肯定了“翻译”在知识推进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语言的翻译并非总是简单的符号替换，有时它能带来思想的增进。他以经济学家德布鲁(Debreu, 1991)用集合论的语言来“翻译”和重构此前用微积分表述的一般均衡理论为例。这次“翻译”使得理论的论证变得更为严格，并能够处理一些旧语言无法处理的问题。他以此类比，认为张博伦提出的“接口政治”并非简单的词语替换，其背后引入了政治学的一整套分析框架，因而具有潜在的“知识增进”价值。更进一步，刘世定引入了拉卡托斯(Lakatos, 2014)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如何处理“经验与理论不符”这一核心问题提供了更复杂的框架。他指出，当理论与事实不符时，研究者可以构建一个“保护带”(protective belt)，通

过不断增加辅助性的条件来维护其核心理论。关键在于判断这个纲领是“进步的”（能持续预测新现象）还是“退化的”（仅仅在事后修补漏洞）。这个方法论工具为学者在面对理论与经验的矛盾时，提供了超越朴素证伪主义的、更为成熟的思考路径。

刘欣和王宁分别从理论的功能框架和类型区分入手，对“从特殊到普遍”的机制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与工具化的提炼。刘欣首先重申，理论创新不取决于研究方法的路径（定量或定性），而取决于思考的深度。他将张博伦提出的“翻译”概念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理论功能框架中进行审视。他列举了理论的五种公认功能：分类、解释、理解、诠释和预测，并以一种建设性的出发点向张博伦提问：“‘翻译’这一新提法，是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功能，还是对既有功能的更优表述？”这种系统性的“框架置入”，是学术共同体消化和评估新思想的典型方式。此外，他为吴肃然提出的“不知与何种理论对话”的困惑提供了解决建议：对话特定领域的前沿理论。他认为社会科学虽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绝对的线性进步，但其在各个分支领域依然存在不断演进的“研究前沿”，这为理论对话提供了明确的靶点。

最后，王宁的发言为整个阶段对理论的讨论进行了类型学区分，指出了“形式理论”（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实质理论”（如韦伯的科层制理论）的根本不同。前者提供的是一般性的分析视角，用以“指导”研究；后者则是具体的解释模型，用以“对话”和“修正”。这一区分，有效解决了研究中常常出现的“对话层级错位”问题。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实现“从特殊到普遍”的核心机制——建构“桥接性概念”（bridging concept）。他以斯麦兹（Smythe，

1977, 1981) 的研究为例, 斯麦兹为了将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剥削的一般理论应用于分析电视观众这一特殊现象, 创造性地提出了“观众商品”(audience commodity) 这一“桥接性概念”。观众通过收看免费电视“领取工资”, 又通过观看广告为电视台“创造价值”, 其间的差额即为被剥削的剩余价值。这个例子完美地展示了“桥接性概念”如何像一座桥梁, 巧妙地将一个高度普遍的理论框架与一个极其特殊的经验情境连接起来。王宁指出, 这种“桥接”工作, 正是绝大多数社会学家能够作出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它澄清了一个事实: 大部分的理论贡献并非石破天惊的原创, 而是对既有理论的“拓展”(extension), 即将其解释边界成功地延伸到一个新的、未曾触及的领域。

四、经验事实的理论化

在系统性地探讨了理论生成的方法与路径之后, 工作坊的讨论进入了最终也是最核心的环节: 经验事实的“理论化”(theorization) 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它需要研究者具备何种心智能力? 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又会遭遇哪些困境与挑战? 这一阶段的讨论, 从对“想象力”的剖析入手, 深入到理论化过程中的伦理困境与制度逻辑, 最终为整场研讨会画上了一个开放而深刻的句号。

陈家建首先对米尔斯经典的“社会学想象力”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二分, 认为其应包含两个层面: 理论想象力与经验想象力。前者指研究者面对社会现象时, 能够从何种抽象角度进行概括和认知的能力, 这已为学界所熟知。而后者, 即“经验想象力”(empirical imagination), 则是一种在当前学术训练中被严重忽视却日益重

要的核心能力。他指出，传统的田野方法论往往预设研究者能够获得“完整、真实”的经验材料，仿佛只要方法得当、投入足够，事实便会自然呈现。他认为这一前提在当代社会已完全不成立。无论是调查一个政府部门的政策运作，还是研究一个村庄的治理变迁，研究者能够获得的永远是碎片化的、真假参半的、被各种利益关系所过滤的信息。因此，“理论化”的第一步，并非直接面对一个完整的经验事实，而是要运用“经验想象力”，从这些有限的片段中，去重构（reconstruct）、推断（infer）和“想象”出一个更宏大、更完整的后台运作过程。例如，要理解一个村庄今天的治理，已远非了解其内部的宗族、文化就足够。研究者必须能够想象并追溯到其背后整个县域乃至国家的治理系统——包括党建、财政、考核等一系列外部力量是如何渗透并塑造这个村庄的。这种能力需要深厚的田野调查素养与广博的跨领域文献积累作为支撑，它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理论化的思维活动。他认为，理论的引入，正是在经验想象力因遭遇现实的复杂性而需要认知框架时，自然发生的过程。

沈原对陈家建的这一观点表示了高度认同，但他进一步强调了两种想象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赞同“经验想象力”的重要性，并以课题组成员对卡车司机记账行为的研究为例（马丹，2025），生动地展示了这种想象力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卡车司机的理性计算模式并非以每一“趟”为单位，而是以一个包含盈亏的完整“圈”为单位；他们对财务状况的感知，也更多地依赖于“手头是否有现金流过”，而非严格的成本核算。要捕捉到这些与经典经济理性人假设相悖的、地方性的行为逻辑，就需要研究者具备强大的经验想象力，能够去“猜”，去多方验证。但他同时也强调，“理论想象力”提供了研究的方向感与筛选机制。面对田野中无限复杂的

细节，是理论想象力帮助研究者决定应该关注什么、忽略什么，从而避免迷失在信息的海洋中。他认为，社会学研究的目标，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石破天惊的“原创理论”，而是更为现实的“理论重构”（reconstruction of theory）。这意味着，研究者是在与既有理论的持续对话中发现其新的适用边界，修正其内在机制或丰富其核心概念。因此，经验想象力负责提供新颖的、挑战性的经验材料，而理论想象力则负责将这些材料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学术脉络中，赋予其普遍性的意义。

王宁则进一步将“经验想象力”这一略显模糊的概念，进行了清晰的概念化与操作化。他将其分解为三个具体的思维层次，从而使其变得可分析、可训练：

（1）“拼图式”想象力。这是指从部分推断整体的能力。如同玩拼图，一个优秀的研究者能够仅凭几块关键的碎片，就大致推断出整幅图像（即社会总体结构或过程）的样貌。

（2）“联结式”想象力。这是指发现事物之间潜在联系的能力。社会现象之间并非孤立存在，但其内在的关联往往是隐性的。经验想象力能够帮助研究者在两个看似不相关的现象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逻辑关联。

（3）“情境化”想象力。这是指将研究对象置于多重、嵌套的情境中进行理解的能力。例如，理解一个村庄，不仅要看到村庄本身，还要看到它在乡镇、县域、国家乃至全球化系统中所处的位置。这种多层次的情境化思维，是避免研究走向片面和浅薄的关键。

王宁总结道，这三种经验想象力与理论想象力是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的。理论为想象提供了方向和框架，而经验想象则为理论提供了新鲜的血肉和挑战性的证据。

张静为“经验想象力”补充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进行“反事实推论”（counterfactual inference）的能力。她指出，一个具有良好经验感的研究者，在面对一个因果论断时，例如“法国大革命导致了平等价值的普及”，会本能地提出一个反事实问题：“如果法国大革命没有发生，平等价值还会不会普及？”这个问题虽然无法在现实中验证，但它能极大地激发研究者的想象力，促使他去寻找其他被忽略的、可能同样重要的影响因素，从而使得最初的因果判断变得更为严谨和精确。此外，她还从知识交流的角度，再次强调了理论的沟通功能。她认为，在跨文化、跨情境的学术交流中，纯粹的经验故事往往难以被理解。只有当不同背景的学者具有可共享的理论框架时，他们才能迅速地把握对方所述经验背后的一般性意义。例如，一个关于中国乡村老人集资修路的故事，对于一个受过训练的外国学者而言，可以迅速被理解为“通过社会资本提供公共品”的案例。因此，理论不仅是分析工具，更是实现知识有效传递和积累的通用语言。

讨论随后转向了理论化实践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研究者如何处理那些与自己理论预设不符的“反面证据”？

吴肃然坦诚地指出了其中的伦理困境。他观察到，在学术实践中，“用理论裁剪经验”的倾向非常普遍。研究者一旦认准了某个理论方向，便会有意无意地筛选甚至扭曲证据来迎合它。他甚至反思自己在指导学生参加“挑战杯”等竞赛时，为了让学生的项目“成功”，有时也不得不“帮助”他们对材料进行某种倾向性的解

读。这种“妥协”让他深感不安，也揭示了在功利主义的学术环境下，保持理论诚实所面临的巨大压力。

刘世定则为这一困境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解决方案。他首先承认，研究者带着理论视角去“裁剪”现实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不可能全知全能。关键在于如何避免走向自我强化的歧路。他建议引入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判别性实验”（crucial experiment）思路。这意味着，研究者在提出一个理论猜想时，必须同时明确它的“禁令”，即如果观察到了某种现象（c），那么我将放弃我原有的理论（ $a \rightarrow b$ ）。这种自觉设立“证伪条件”的思维习惯，是防止研究者自欺欺人的重要保障。此外，他还提出了另一种重要的理论化路径：去解读调查对象自身的“理论架构”。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政策制定者，其行动背后都有一套自洽的世界观和因果假设。研究者的任务，不仅是记录他们的言行，更是要深入分析其背后的思维模式。这种对“常人理论”的解读，往往能极大地启发研究者自身的理论思考。

随后的讨论中，张博伦再次强调了寻找否定性证据的重要性。他引用贝克尔（2017）和马丁（2020）等人的观点，认为研究者应主动去寻找那些“最不可能成立的地方”，如果在那里都无法推翻自己的假设，那么其理论才更具说服力。他还指出，许多看似简单的“描述性研究”，其“有趣”之处恰恰在于对“是什么”（what）这一层次的深入挖掘，而这往往是后续所有理论化的起点，不应被学界轻视。

洪岩璧从宏观层面再次点明了国内理论创新的普遍不足。他观察到，我们常常在应用西方经典理论时，忽视了其诞生的时代背景与适用条件，导致理论的滥用。而本土的所谓“创新”，又大多停

留在创造新词语的层面，缺乏实质性的概念与命题建构。他以教育社会学中“底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为例进行了讨论。

向静林从个案研究的方法论出发，系统地总结了他所认为的“理论化”三部曲：发现因变量、寻找自变量、厘清因果机制。他强调，个案研究之所以困难，其本质在于研究者必须从个案呈现的无数变量特定“取值”的组合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需要研究者具备专业的训练、经验的观察、理论的积累、对现象与理论之间关系的敏感度，以及对经验现象进行概念化的能力。

陈思宇则以其日常工作的观察，生动地揭示了“理论化”文章在发表过程中所遵循的现实逻辑。她明确指出，期刊所期待的真正具有学理性的文章，绝不是“用理论去套一个现象”，而必须是“从经验问题中追问并生发出理论”。她观察到，尽管面临影响因子、发表周期等种种压力，但那些基于坚实经验事实的理论化文章才具有最长久的生命力。她的发言，从知识生产的终端，反向印证了整场工作坊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

王金水结合方法教学和期刊编辑工作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个关键区分：我们教给学生的和研究的究竟是如何做研究的方法（研究的设计），还是研究方法（实证资料搜集与分析方法）。前者是关乎从事实到理论的思维过程，而后者则容易被简化为软件操作或访谈技巧等技术性指导。他认为，当前的方法教学以及研究偏重后者，不利于研究思维能力的提高。

五、求索作为结论：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路径映照

面对这场以“本土经验事实理论化”为核心议题的工作坊，本篇综述试图记录下一系列精彩的、创新的学术观点，同样也试图记录下到场社会学学人在面对时代与学科的双重挑战时，所进行的一次集体反思与路径求索的完整思辨过程。本篇综述旨在展现其围绕“理论与经验”关系而展开的思想碰撞和共识凝结的过程。工作坊整体讨论过程如同一场思想接力，围绕“理论与经验”关系的主题展开辨析和反思，探究“从特殊到普遍”的可行路径，着力于解决“经验事实的理论化”的困境，并探求未来可能和出路。

这次学术研讨，同样也是一次中国社会学知识共同体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诊断和路径求索。这场思想接力的内核，展现了社会学研究中一种根本性的、在理论与经验之间往复互动的双向建构逻辑。它揭示了一条通往成熟的、具有自主性的知识体系的核心治学之道。

第一条路径，是从理论与方法论的自觉出发，对经验研究进行系统性的审视与准备。工作坊的前半程，与会学者通过对理论传统的系统性批判（张静）、对理论思维“三无”困境的深刻剖析（刘世定）、对研究贡献路径的清晰规划（王宁）以及对社会科学知识特性的精确界定（刘欣），共同确立了一个核心前提：一个严谨的研究者，不能在缺乏理论准备的情况下直接进入经验世界。他必须携带必要的“理论库”，秉持清醒的“方法论自觉”，并掌握有效的“概念化”工具。这一系列的讨论共同指向一个基本原则：缺乏理论的系统性准备与方法论自觉，研究者在面对经验世界时将难以进

行有效的知识提炼。

第二条路径，则是从经验事实的挑战出发，对理论进行重构与创新的过程。工作坊的后半程生动地展演了这一创造性过程。无论是吴肃然在个人学术历程中因经验的撞击而不断校准“理论库”，还是张博伦从一个具体的“经验困惑”中提炼出“接口政治”的理论雏形，都展现了鲜活的经验事实如何成为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陈家建提出的“经验想象力”，沈原对“悖论”的激赏，以及王宁关于“桥接性概念”的提炼，共同为如何从特殊的、碎片化的经验中，升华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方法与路径。这一路径揭示了另一个基本原则：若脱离了鲜活经验事实的持续检验与挑战，理论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僵化，丧失其解释力与生命力。

最终，这两条路径在工作坊的讨论中并非相互孤立，而是构成了一个完整、互动的认知循环。一个自觉的理论立场使得研究者能够带着更敏锐的分析框架进入田野，从而捕捉到更具挑战性的经验事实；而这些经验事实带来的“困惑”与“悖论”，又反过来迫使研究者去修正、拓展乃至“重构”其最初的理论框架。这正是从“理论的消费者”转变为“理论的生产者”的道路。

本次工作坊的真正成果，或许不在于为“本土经验理论化”提供任何一劳永逸的终极答案，而在于它以集体智慧的方式，生动地“展演”了这一过程本身。它为中国社会学界同人提供了一份方法论的路线图，也传递了一种治学的精神与态度：我们应在理论的自觉与经验的谦卑之间保持张力，在抽象的逻辑建构与生动的现实关怀之间往复穿梭，在独立的深耕与开放的对话之间寻求平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负这个时代赋予的“经验富矿”，真正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既植根于本土又具有普遍性关怀的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 霍华德·S. 贝克尔, 2017, 《社会学家的窍门: 当你做研究时你应该想些什么?》, 重庆大学出版社。
- 马丹, 2025, 《金钱标记的理性化与非理性化——2024年卡车司机账目调查报告》, 《社会学评论》第3期。
- 王宁, 2022, 《迈向社会学中国化2.0版: 挑战与路径》, 《社会》第6期。
- 约翰·李维·马丁, 2020, 《领悟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误用及解决之道》,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周雪光, 2005, 《“逆向软预算约束”: 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Debreu, G. 1952. “A Social Equilibrium Existence Theorem.”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38(10).
- Debreu, G. 1991. “The Mathematization of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1).
- Lakatos, I. 2014.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Philosophy, Science, and History*. Routledge.
- Latour, B. 2012. “Visualisation and Cognition: Drawing Things Together.” *AVANT. Pismo Awangardy Filozoficzno-Naukowej* (3).
- Merton, R.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Simon and Schuster.
- Peng, Yusheng, 2004. “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5).
- Peng, Yusheng, 2010. “When Formal Laws and Informal Norms Collide: Lineage Networks versus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6(3).
- Reynolds, P. D. 2015. *Primer in Theory Construction: An A & B Classics Edition*. Routledge.
- Small, M. L. and Feldman, J. 2011. “Ethnographic evidence, heterogeneity, and neighbourhood effects after moving to opportunity.” In *Neighbourhood effects research: New perspectives*.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 Small, M. L. 2013. “Causal thinking and ethnographic resear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9(3).

Small, M. L., Manduca, R. A., and Johnston, W. R. 2018. "Ethnography, neighborhood effects, and the rising heterogeneity of poor neighborhoods across cities." *City & Community* 17(3).

Small, M. L. 2021. "What is 'qualitativ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Why the answer does not matter but the question is important." *Qualitative Sociology* 44(4).

Smythe, D.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theory* 1(3).

Smythe, D. W. 1981.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Hong Kong: Blackwell Publishing.